

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

〔英〕拉尔夫·密利本德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04157/20
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

〔英〕拉尔夫·密利本德 著

博 铨 向 东 译

马 清 槐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8年·北京

**CAPITALIST DEMOCRACY
IN BRITAIN**

Ralph Miliband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2

根据美国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译出

YINGGUO ZIBENZHUYI MINZHU ZHI
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

〔英〕拉尔夫·密利本德 著

博 铨 向 东 译 马清槐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香 河 安 平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0331-8/D·20

1988 年 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3,800 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43 千

印张 6 1/8

定价: 1.3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是英国的政治学家。他曾在伦敦经济学院执教多年,1972至1978年,在利兹大学任政治学教授;1982年起,任美国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朗德斯大学劳工系教授,主讲“社会思想”课。除本书外,他还著有《议会社会主义:劳工政治研究》(1961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1969年)、《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年)^①。

本书的主题是论述英国自1867年扩大普选权以来,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如何抑制来自人民群众的压力,并且防范这种压力得以有组织地迸发成社会动乱,从而保持了英国政局和社会秩序连续一百多年的相对稳定,避免了激烈的社会革命。作者指出,在英国,国家的任务一向是满足资本的需要但又不致使工人阶级疏远到爆发危机的程度。无论是保守党或者工党,都在帮助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效力。英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在抑制和缓和人民群众的压力并使之不向对抗方面发展上,是成功的。代议制、普选权、劳工党和工会,都在遏制阶级冲突中发挥作用,其中代议制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影响最大。各种政治力量都利用代议制民主遏制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工党也不例外。英国工党虽曾几次上台执政,但是不同时期的领袖人物都反对实行激进的政策。工党的工会尽管领导这样那样的罢工,但其基本作用是调解工人与雇主或政府

^① 1984年,商务印书馆已出版中译本。

之间的冲突。不过，工会的情况也在变化。五十年代正统的工会领导人还能控制工人群众，到六十、七十年代，他们就不能充任工会会员的代理人了。工人阶级由于技能、性别、种族、宗教和政治信念的不同而出现了分裂。

关于英国的统治阶级的构成，本书作者指出，除资本家阶级外，还有政党领袖、高级文官、国营企业经理、法官和军警的高级首脑、律师、会计师、教会领袖和通讯专家，等等。这些人合在一起掌握生产、劝说和威慑手段，组成英国的统治阶级和权力核心。这些人的共性中，最重要的是思想意识和政治上的一致性。

本书对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前途也作了估计，认为以前在英国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良好的条件下，这种民主制可以正常维持；目前，英国在走下坡路，国内问题也比较多，这种民主制能否照样维持已成疑问。一种可能是这种资本主义民主制变为保守主义独裁。另一种可能是，工人形成强大压力，通过议会多数提出改革，使工党上台。从当前情况来看，工党只会因循守旧，拿不出革新的纲领，还不能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对英国现有权力结构进行有效的挑战。

1987年7月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言	2
第二章 议会制度	25
第三章 遏制压力	65
第四章 处理阶级冲突	111
第五章 阶级、权力和地方政府	153
第六章 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前途	170

序

这是一本论述英国政治体制的书，但我的宗旨并不是要详尽地描述这一体制的不同的部分。对此，许多书籍已经有了精辟的阐释。另一方面，在有关这一题材的论著中，却很少有人对我认为自 1867 年扩大普选权以来贯串于我国政治体制的一根主线，给予应有的注意——或稍加注意。这根主线就是：各类负责人员关心抑制和减少民众的压力，特别是注意消除那种压力得以有组织地表露出来的机会。

我试图在本书表明，英国政治体制的不同组成部分构成一种遏制制度；我认为，只有把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当作这样一种体制的一部分来考察，我们才能很好地了解其性质和作用。我完全相信，这种方法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研讨，也需要进行更为详尽的验证工作。但我希望我在这里提出的见解能有助于人们领会英国政治体制的精神和目的，能促使他们按照这种方式作进一步的研究。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约翰·萨维尔和安德普·舒勒对本书提出了一些极为有益的建议，特此致谢。我的妻子玛丽恩·科扎克对写作本书出谋划策，并给予鼓励，我深为感激。为此，为了其他很多原因，谨将本书奉献于她。

自不待言，全部文责只能由我一人来负。

拉尔夫·密利本德

1982年4月

第一章 导言

我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是指《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通过以来，特别是1918年和1928年两次选举法导致普选制包括全部成年人以来，逐渐发展而成的英国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一般叫做“民主制”，认为英国是个“民主国家”这一概念已被看作一项十分明显的真理，不必多加究诘。这是以许多重大的未决问题为依据的：如果民主制被解释为民众参与决策和控制国事的处理办法，英国的政体就远非民主；本书的主要命题之一，是论证这一政体始终尽可能致力于扼制而决非助长民众行使决策权和处理国事的权力。民主的要求和政治的现实并不真正相适应。

另一方面，英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吸收了不少民主的特征，这就使得“老百姓”有可能反映他们的意见，迫使当权者多少要考虑一点民众的疾苦和要求。事实上，由于在一次大选中民意发生转变，当权派可能发现自己顾不到体察民情。这对实际的权力结构来说，其意义也许远没有象人们所宣称或相信的那样大；但它也可能产生重大的政策影响，不能认为无足轻重，不予考虑。

“资本主义民主制”这一提法，也往往用来表示象在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经常存在和无法消除的矛盾现象或紧张关系，一方面保证民众享有体现在奉为神圣的普选权中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横加阻挠，拒不实行那种诺言。固然有一套民主制度和惯例使工人阶级、参加工会的工人、各个政党和团体等能够赖以自下而上地施加压力和提出要求，来表达意见和选派代表；但资本主义制

度的整个背景又要求尽可能地削弱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要在本书论证，所有管理国家和其它权力机关的人时刻关心着如何能够遏制和减轻民众的压力。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依靠精心的控制，还依靠种种鼓励无所作为和听天由命而绝非鼓励压力和斗争的习惯、传统和规矩。即使如此，资本主义制度和所有其它统治制度一样，历来需要并且目前更其需要遏制来自下层的压力；可以说，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历史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如何成功地多方实现了这一遏制。当我们回忆起这个时期发生的造成大规模破坏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而英国仍能保持一个极端不平等的和阶级界线分明的国家时，我们就一定会承认这一成就更为令人瞩目了。

从一项明显的意义上讲，英国的纪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也已经成功地遏制了压力和抗争。但其它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都没有如此顺利和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这决不是要竭力低估在遏制压力时使用高压手段一直是达到社会一致同意的重要因素。然而同样确实的是，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相比，有些英国人在相对的但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安定的情况下，一直享受着权力和特权，而这些权力和特权是大多数人所承认的。只要看一看英国统治爱尔兰和继续统治北爱尔兰的方法，就可看出在控制和遏制抗争方面成败的鲜明对照。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探讨英国的政治体制对于实现高度的社会和政治安定所作出的贡献。

可以说，掌管国事的人抱有其它许多意图和目的——促进经济增长，维护领域安全，谋取和保卫帝国的利益，实现财政稳定和社会改革等等；另外还有求得他们自己地位的提升，扩大他们的声望，谋得某种官职和保住那个职位等打算。但是所有这些目的，都无一例外地同遏制压力和控制抗争的任务紧密相连。例如，人们出于种种不同的理由，鼓吹和实施社会改革；但是，此举之所以并

不与其它理由相矛盾，一个主要理由是希望那种改革会削弱抗争的锋芒，有助于实现社会安定。^①同样，那些赞成海外扩张的人希望那种改革主要会促进国家的繁荣，以达到同样的目的。^②不论从哪方面考虑，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那种想要遏制来自下层的压力的愿望，使我们得以了解英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和精神：其余一切均取决于这一愿望。

这并不是说，英国的统治者经常无法摆脱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这种恐惧颇为高涨的年代：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和紧接几次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年代；宪章运动的最初年代和184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以及战后的若干年份；可能有1926年和1931—1932年，甚至还有1972—1974年以及1978—1979年的冬天。但是总的来说，大部分的时间具有散布面很广而较少惊心动魄事件的特征——总有一种潜在的危机感，一种认为尚未临头但很可能一触即发的惶遽心理。在1880年保守党人遭

① 温斯顿·丘吉尔就社会保险问题作过一番恰当的阐述。他在1925年担任财政大臣时，曾接见过一个由若干雇主组织派出的代表团。代表团警告说，保险计划的影响正在开始损害国民性格并破坏俭约和自力更生的精神。“我认为，”丘吉尔回答说，“不管保险制度对个人的自力更生精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它将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绝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必将发挥其维系人心的作用，尽管他们的语言和情绪在许多情况下可能看起来并不表明这一点。它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安定团结和秩序井然。”（吉尔伯特：《温斯顿·丘吉尔传略，1922—1939年》，1976年版，第五章，第108页）。丘吉尔还写信给英王乔治五世说，国民保险使“千百万人享有一部分国家的利益，这种利益主要依靠他们自己努力作出贡献才能创造出来”（同上书第111页）。

② 对于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5年）一文中引述的这样一种希望的经典措词，请注意塞西尔·罗兹在1895年讲的一段话：“我的神圣的主张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四千万居民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出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列宁选集》，1969年英文版，第225页。〔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799页。——译者〕）

到惨败之后，素来不尚危言耸听的索尔兹伯里勋爵^①在给他外甥阿瑟·鲍尔弗^②的信中写道，他所说的“飓风”在他看来表示“某种要求改革的明确愿望；是确有其事的”。“它可能来得快也去得快，”他接着说，“否则就能成为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开端。”^③这种可能有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感觉一直成为英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思想，即使并不总是十分明确；由于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惧怕共产主义可能进一步蔓延，这种感觉变得愈加强烈。从那以后，遏制阶级冲突一直成为英国所有重要政界人物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只要情况有此要求，他们就不惜一战并力求胜利；但他们还是尽量采取力求避免暴力冲突的方针。为此，代议制机构、普遍选举权、工会和劳工政党可以发挥出比人们乍看起来认为可能发挥的更为有效的作用。毫无疑问，它们会被看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用以开展阶级斗争和施加压力的许多武器；但当时人们也看到，这些民主的形式也可能有助于疏导和减少压力与冲突。

大体上说，主管政务的人所要解决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革命的威胁，而是他们认为需要去遏制“国家”所经受不起的那种要求改革的压力。不仅有必要对付那种或许会对现有制度构成重大挑战的压力，而且要对付许多不是那么咄咄逼人的要求。去反对一切改革要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而更恰当地说是要尽量减少其代价和缩小其范围。在这方面，政治上最行不大通的事恰恰是最需要去完成的事。英国的政治体制完全适合于这样一种处理方法，因为它会很容易地变成一条处处设坝的河道，要求改革和革新的急湍自上而下便自然成为涓涓细流。

① 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1830—1903)，英国政治家。——译者

② 阿瑟·詹姆斯·鲍尔弗(Arthur James Balfour)(1848—1930)，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1902—1905年任首相。——译者

③ 詹姆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1959年版，第72页。

一心想要限制改革的范围和代价的，并不只是保守党、自由党等一类政界人士。相反，完全可以这样说，工党的大臣们同样有那种迫切的心情。工党的政治活动家诚然要求改革，并且经常宣称他们想对社会秩序实行一些重大的改革。但是他们执政以后，就立即倾向于扼杀他们在身处反对党地位时表示过的改革热情；他们毅然决然地同工党运动中那些要求他们多采取一点措施的人进行斗争。

自十九世纪末叶以后，英国政界的精神领域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感到英国在各国中间短期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在消失的观念，另外还有感到过去凭借那种优势才能获得的利益濒于丧失的观念。这一特征不仅使保守党政治活动家、尤其是自由党政治活动家，而且还使许多工党政治活动家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动荡乃至社会动乱的恐惧。在二十世纪一直主持国务的那些人的著作和回忆录中，纵然洋溢着想要维护所能维护的一切利益的坚强意志，同时却充满着没落危殆之感。在190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霍尔丹^①即后来的霍尔丹勋爵写道：“现今，当此二十世纪之初，我们必须举国一致地解决维护我国伟大商业地位的问题，并同时解决维护过去许多世代的伟人艰苦创立并留传给我们的伟大帝国的问题。”^②

这段话并非确切的全面论述，但在这里至关紧要并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它反映出那种需要解决维护问题的观点。因此，罗伯特·布莱克^③也指出，“在迪斯雷利^④的水晶宫讲话发表三十年之

① 霍尔丹 (Richard Burton Haldane) (1856—1928)，苏格兰政治家和哲学家。——译者

② 霍尔丹：《教育与帝国》，1902年版，第viii页。

③ 罗伯特·布莱克 (Robert Blake) (1916—)，英国议员、作家。——译者

④ 本杰明·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作家，1868年和1874—1880年任首相。——译者

后,当鲍尔弗在1902年出任首相时,大家对于英国同其对手相比地位有了逆转这一点,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英国的安全,乃至它的生存,已经不再是毫无问题了。”^①在之后的几十年间,这一认识又有了提高,并由于英国的地位不断地相对衰落而有所加深。《泰晤士报》在1976年底展望英女王登位二十五周年的1977年时曾正确地概述了这种情绪,它在谈到前二十五年的时候写道:“认识到国家的败绩,哪怕仅仅是相对的失败,也是令人肠断的。”^②

然而,国家的败绩和阶级的胜利完全可以并行不悖。阶级的胜利意味着一个统治阶级有能力维护其社会地位,有能力控制和抑制任何对它的权力和特权提出的挑战。英国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国家的失败可能总有一天会开始威胁阶级的胜利;但它至今尚未产生过这种作用。我在这里力求解答的问题是“其故何在”?

二

阶级和阶级冲突,是目前要分析的两个基本概念,需要先作一些探讨。

我已提过的英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大规模改造,自然在英国阶级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中表示出来。但这些变化是发生在两个“基本”阶级的构成上而不是它们的实际存在上:一方面是大家惯常称之为“统治阶级”的阶级,其核心为资本家成分,也就是真正控制(也许占有,也许并不占有)私有经济力量主要手段的人们;另一方面是从属阶级,主要由工人阶级组成,其更为确切的定义目前尚待规定。在过去的二百年间,这两个阶级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

① 罗伯特·布莱克(勋爵):《从皮尔到丘吉尔的保守党》,1870年版,第169页。有一位带有保守倾向的历史学家甚至提出,“1914这一年大体上是身为英国人开始感到没趣的时刻”(W.N.梅德利科特:《当代英国,1914—1964年》,1976年版,第79页)。这也许多少有点说得过分了。

② 1976年12月31日《泰晤士报》。

的变化,但也有一些至关重要的连续性,这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经久不变的事实,即一方面是私人占有和控制主要的经济活动手段,而另一方面却没有这种占有和控制。

从工业革命时代直至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资本家阶级”可以说主要是由这样一群散布面极广的人员组成的,他们拥有企业,或拥有企业的大量股份,同时还控制和经营这些企业。随着经济活动单位愈来愈趋集中,到二十世纪这种集中已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少数公司已开始在它们的活动领域占据了领导甚至统治的地位;^①这又势必随之引起大公司“经营管理专业化”的日益发展,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现象经常越来越明显,因此,那些控制着庞大工业、金融和商业企业的人充其量不过占有这些企业的极小一部分。业主兼管理人员并没有消失,他们依然是经济(以及社会和政治)舞台上大家所熟稔的重要角色,但趋向集中、从而趋向“经营管理专业化”的势头仍然是极其强大的。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随着所有权与控制权的集中和分离而引起的变革的重大意义,以及关于私有经济成分管理人员的性质、作用和目的的变化所产生的重大意义,长期以来存有争议,这里不必介入。我个人认为,这些变革并没有给这一制度的动态带来任何根本的变化;把这些有关的人统称为“资本家阶级”,现在和从前一样都是合理的。

除开这个资本家阶级,还有一些人在国家机构占据上层职位——政党领袖、高级文职官员、国营企业经理、法官和高级军警首脑;可以并入这一类的还有专业生活中的上层人士,诸如律师、

^① 参阅例如普雷斯,《英国大公司的演变,1909—1970年》,1976年版。普雷斯教授谈到“大企业的新世界”(第1页)和一种“增加集中程度的强烈趋势,因为在制造业的总产量中,一百家最大企业所占的份额已由1909年的百分之十六上升到1970年的百分之四十一左右”(第4页)。他指出,资本的集中在英国比在美国更加厉害。

会计师、教会领袖以及通讯系统的其他专家。这些人合在一起，掌握着生产手段、劝说手段和慑服手段。他们组成英国的“统治阶级”、“权力核心”和幕后统治集团。正是他们在负责管理主要的机构，借以行使权力、履行责任和施加影响；与此相关，也是他们组成收入额的较高和最高等级；大部分的私有财富就是分配给他们这些人的。

这个统治阶级的成员之间情况当然千差万别。资本家和国家公务员履行着不同的职责并受制于不同的约束，这一事实导致了这些差别当中若干最重要的差别。资本家主要关怀他们自己的具体经济领域，并且作为资本家，要听命于他们所控制和管理的资本的迫切要求（或者是他们认为的迫切要求）。大臣们、民政机关和其它机构公务员们必须看得远一些，他们所关心的事项各有不同：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也许是唯一的主要职责——是要采取行动，以遏制来自下层的压力，调处阶级冲突和维护社会制度的稳定。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可能需要办一些为大部分甚至整个资本家阶级所不乐意的的事情。

尽管这样，统治阶级的成员中间还有很大程度的共同性，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社会背景、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上有着非常类似的地方。大多数人出生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受过住读中学和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教育。他们许多人彼此有亲戚关系。^①其中有些人在开始参加社会生活时是门外汉，但他们很容易为这个统治阶级所同化，开始吸收它的生活和思想习惯，而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同化作用成为在那个阶级得到擢升和成功的重要条件。那些属于经济生活私有部分的人，有的自己谋求，有的奉召出

^① 请参阅特别是格茨曼：《英国政界精英》，1963年版；J.尤里和J.韦克福德合编：《权力在英国》，1973年版；以及吉登斯和斯坦沃思“名流和特权”一文，见艾布拉姆斯编：《工作、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不等现象》，1978年版。

任不同形式的公职；又有许多长期担任公职的人涉足商界。他们经常彼此交叉换位，在走马灯式的会议、午餐会、晚宴、重大集会和仪式上以各种各样的部、委、局、厅、司、处、署等机构的成员身分出现。

在所有共性当中，最为重要的是思想意识和政治观点上具有程度极高的一致性，这是统治阶级大多数成员的特征。这方面也经常存在着大量的意见分歧和分裂，但它们都发生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方面比较狭窄的范围之内，并不妨碍他们对那些逸出渐进的、零零碎碎的谨慎改革界线的计划方案和方针政策抱有共同的敌意。在整个十九世纪，情况便是如此；那时英国分成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两个主要的派别。到了二十世纪，情况实际上依然如此，不过这时主要的两派变成了保守党和工党。

与此相关，有些人往往很重视据说存在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内的各种“派别”。不能否认有这样一些“派别”存在，特别是两大派别的存在，一派是伦敦商界、银行界和金融界组成的资本集团，另一派是工业资本集团。也无可怀疑，由于前者同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关系密切，它比后者对经济和金融政策已经产生了远为巨大的影响。尽管如此，这里需要把两类往往容易混淆的问题截然分开：金融资本占压倒优势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当金融资本同工业资本发生任何严重的冲突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事实上，其所以有这样一些“派别”存在，极为令人注目的一点恰恰在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严重的冲突。弗兰克·朗斯特雷思在对这种共存现象作了一番有用的调查之后指出：“连接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方式已经大受限制，而这在过去主要是由于人们赞成帝国体制，从而承认金融界在该体制中的关键作用所致。”^①除了“帝国体制”之外，其

① 弗兰克·朗斯特雷思：“城市、工业和国家”一文，见克劳奇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1979年版，第162页。

它一些因素无疑地也有助于说明工业资本承认金融资本占据优势的情况，特别是它作为工业资本，并没有在那种优势下过分遭受损失。^①无论如何，这种一直存在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内的经济区分却在政治方面并没有任何很大的反映：在保守党内部或其它任何地方，从来不曾发生过“工业党”和“金融党”互相争斗的事情——也就没有由此而危及党的紧密结合和基本团结。

在不同的程度上，人们也容易辨别保守主义内两派的分歧，大致说来那就是右翼立场和政策的多与少之间的分歧，即保守思想深浅程度不同之间的分歧。这在所有的政策范围内均有表现，特别是在保守党对工会、罢工、法律和秩序、福利、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改革和压制的态度上——总之，在其对遏制政策的战略战术的态度上尤其如此。而且，两派的界线往往是模糊不清、不时移动的，它们从未深化到在思想意识上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保守主义包含许多倾向，能够容纳除了真正鼓吹在英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的人之外的几乎各色右翼人士。

“工人阶级”一词通常主要用来指体力劳动者，但这种含义局限性太大，在当今的条件下尤其如此。到目前，已有过半数的就业人口从事非体力行业；这类人员大都受雇做办公室抄写、分配和“服务”工作，是一部分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集体工人”的人员，他们无疑是“工人阶级”（尽管他们有许多人可能拒绝这个美称）。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是由处于生产过程从属部分的绝大多数工人所组成；他们的从属地位使他们同较小一部

^① 又请注意：“随着伦敦各金融机构的增加，对新建工商企业的无固定利息的风险投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联合起来，进入中期和长期工业资本市场，同时增加它们顾客的分期付款业务，并提供范围日益扩大的财政和经营管理服务”（杰索普，“战后英国的国家变化”一文，见斯凯斯编：《西欧国家》，1980年版，第30页）。